

華西與後集體主義

● 楊小輝



村莊是分析中國鄉村國家與社會關係最合適的單位。周怡將目光投向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試圖描繪轉型經濟中，該村內部凝聚、團結及整合的整體畫面，探究其中的種種迷思。

周怡：《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分析中國鄉村國家與社會關係最合適的單位。周怡從前輩學人這樣的深刻洞悉出發，將目光投向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試圖描繪轉型經濟中，該村內部凝聚、團結及整合的整體畫面，探究其中的種種迷思 (myth)。

《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後集體主義》（以下簡稱《中國第一村》，引用只註頁碼）共分為七個部分。理論架構着重於第一章和第二章文獻回顧之後的思考，第三、四、五及第六章分別述說村莊整合的各個不同主題，形成作者所謂後集體主義社區的「一個邏輯起點和三大特徵」，最後一章則試圖確定後集體主義在時代坐標中的方位。下面筆者擬就個人感興趣的問題，對本書作一簡單介紹。

一

費孝通說，鄉土性是中國社會的基礎，理解了鄉土社會，才可能理解中國社會。戴慕珍 (Jean C. Oi) 則認為，正是在村莊這樣一個舞台上，國家與社會相遇，因此村莊是

二

1、何謂後集體主義

所謂後集體主義乃是對人民公社時代集體主義繼承、消解和再造的整合體，既受傳統農業、計劃再分配體制的影響，又是現代工業和

市場經濟的結果。從「後」的意義上來說，它是集體過度分化與過度整合的矛盾產物。其發展軌迹如下：

公社集體模式(農業／計劃)→國家、集體再分配模式(工業／計劃)
→公司資本主義模式(工業／市場)
(頁8)

2、嵌入宗教迷彩的地理景觀

周怡認為，華西村的空間布局嵌入了一層淡淡的宗教迷彩，以村莊的標誌性建築金塔為中心向外擴展，半同心圓構成的等級空間格局十分明顯。中央矗立金塔的地方作為華西人和外來打工者的公共空間，體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精神。環抱金塔的第一圈，是由六十四座「洋樓」和三百八十幢整齊劃一的樓宇所組成的村民居所。沒有村民戶口或特許出入證件，常人無法進入村內。華西村正是通過這種與外界的「區隔」來強化村民的集體認同。鐵柵欄之外圈，是外來打工者棲身的筒子樓，遠遠看去，像一道守護村莊的圍牆。對於村民來說，它構成了「家」與「廠」的界限、「村莊」與「企業」的分界。最外一圈，則是華西下屬的五十八家企業的所在地，由它們所構成的這一圈是開放的，無遮無攔。在四十多年前由十二個自然村組合而成的華西村，原本的血緣、親緣關係並未淡褪，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極權行政力量依然是現在村民的整合基礎(頁21)。也正是行政力量將從前分散的村落改造成這種差序格局的樣態，讓居住在村莊核心區的村民體驗到一種宗教共同體般的神聖與榮耀。

3、村莊的整合邏輯：後集體主義之實踐

由於後集體主義是社區分化與整合的結果，因此全書的主體部分主要描述了此一過程，其分析的重點在於揭示，在急劇分化條件下村莊的整合邏輯。作者的研究表明，在華西村整合與分化的辯證關係中，村莊發展的邏輯起點和最終結果均是整合。起點在1961年建村時國家政權強制下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的整合，終點在作者着手研究的2003年初，表現為歷經四度整合與分化的博弈過程之後，村莊在自主空間裏所主動選擇的「後集體主義」整合(頁13)。以下四次整合，事實上均是華西人經過價值理性(追求社會主義集體富裕的精神理念)與工具理性(追求效益：滿足個人需求或獲得利潤的經濟理念)權衡之後，主動選擇的結果。

一、工業整合。當「去集體化」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興起之時，華西村已是全國農業集體經濟的一面紅旗。如何維護這面旗幟賦予華西村的聲譽，保持集體經濟的完整不衰，是轉型經濟初期村幹部急欲實現的目標。為此，需建立起村民對集體信任和依賴的經濟機制，而只有搞好經濟，提高生活水平，村民才可能心向集體，自覺整合於集體。這樣，努力發展集體經濟，就成為當時社區整合的目標定位。這一階段，華西村自發抵制了全國範圍內「分田到戶」的浪潮，選定走發展集體工業的共同富裕之路。工業整合是村莊經歷的第一級整合(頁79-130、13-14)，其直接後果是：度過貧困危機，實現了華西村集體經濟的快速增長。

周怡認為，華西村的空間布局嵌入了一層淡淡的宗教迷彩，以村莊的標誌性建築金塔為中心向外擴展，半同心圓構成的等級空間格局十分明顯。華西村通過與外界的「區隔」來強化村民的集體認同。

華西從毛時代集體的「非層化」，到現時代仍然是村莊集體經濟的「層化」，其分層核心在於行政權力。行政權操縱了整個村莊的分層，權力把持者最終又使自己成為最大獲益者。

二、利益整合。華西在經濟成功轉型之際，結構分化與層級分化幾乎同時出現。在市場推動下，村莊規模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從而導致組織機構分化，勞動分工細化，職業角色增多，由此產生村莊內部集團、部門和個人的本位利益，以及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衝突。為保證社區共同體的整合，華西村選擇施以必要的經濟刺激，拉開收入檔次，人為製造了外來打工者、普通村民、一般村企業管理者和村莊權威領導者之間的層級分化。這是發生於村莊的第二級整合：分化的整合，亦即利益整合。（頁131-79、14）。利益整合使得華西度過了經濟分化的危機。儘管社區原本較為平均、和諧的寧靜被打破了，但村莊層面的共享價值觀念和集體主義行為趨向卻依然存在。華西從毛時代集體的「非層化」，到現時代仍然是村莊集體經濟的「層化」，其分層核心在於行政權力。行政權操縱了整個村莊的分層，權力把持者最終又使自己成為最大獲益者（頁176）。

三、制度整合。上述為整合而分化，潛伏了進一步的整合危機。一旦地位身份和經濟關係的分層出現，也就預示着不同階層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信仰及生活方式等將出現分歧。在毛時代即走紅的華西人，歷來將意識形態、精神歸屬的統一視為重中之重。因而，在施以經濟刺激的同時，他們的整合目標更瞄準全方位制度整合，包括生產管理制度、生活方式制度和村規民約等，幾近是鉅細無遺。其中，規範、制約和懲罰的條例遠遠超過激勵。用慣習和制度禁錮村民的自

由，用懲罰作為保護集體的武器，導致華西人的價值理性無法抗衡工具理性，出現文化分化之後的又一整合舉措：制度整合（頁180-224、14-15）。制度整合使村莊度過了文化分化的危機。值得注意的是，當經濟增長、實現規模經濟的時候，那種屬於農業集體經濟時代的慣習和制度環境，如經常性的政治動員、集體消費、閒暇控制等，依然對社區整合及村民精神共同體的凝聚起主導作用（頁17）。

四、權威產權整合。制度「過度」帶有專制集權的意味，容易窒息新的增長點；制度「不足」又不能抵擋變革所帶來的失序、無序、失範，乃至衝突將時刻威脅華西村的集體整合。華西人發現，如果不從產權上作根本改革，如果不建立人與人、部門與部門之間的互信和忠誠，村莊依然有可能解體。截至2003年春節，當吳仁寶宣布「我個人將享有整個華西的51%的股份控制權」的時候，一個原先由村集體成員搭建的領導班底逐漸被親緣關係所替代時，很多人說，華西村變了，集體的產權性質正在向股權分割的私有、家族控制轉變。可是作者的研究卻表明，華西經濟產權上的權威壟斷、族親壟斷，同樣服從於村莊共同體整合的需要，這就是所謂第四級整合：權威產權整合（頁225-83、15-16）。它使得村莊度過了分權危機。其特徵是：面對外部市場經濟私有化浪潮的衝擊，華西村自如地運用兩種機制的組合——內部再分配兼顧市場原則，對外實行徹底的市場機制，拉開內外差距，平衡內外利益，維護集體利益。同時，為防止分權、市場不確

定因素、系統整合失序等對村莊的干擾，華西村又將集體政權逐漸轉入親屬能人手中(頁17-18)。

華西村從人民公社的集體走到今天的後集體，先後經歷了上述四個階段的整合。整合行動的宗旨始終如一，即追求集體不朽；但四個階段的分化卻各不相同，分別為工業的、層級的、制度的和產權的(頁75-77)。具體地說，就是工業整合延續了農業社會公社模式的集體主義範型；制度整合借助了以往的鄉村習俗(集體消費/時間觀/勞作觀)和村規民約；權威整合一方面從再分配體制中習得，另一方面，族親關係整合則是面對系統整合挫折時對古老傳統的復歸(頁18)。

三

本書特色，略舉一二。

首先，作者的「問題意識」十分明確，直接指出最為核心的後集體主義的整合問題。書中不僅注意到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鼎革、突變，更進一步探求其漸次過渡、承接遞進的脈絡，既看到了時代變遷的影響、制度之間的差異、行為選擇趨向的不同，還辨識出其內在理路的傳承與融通。

其次，作者為我們提供了諸多見微知著的細節。比如：儘管2002年村民存入集體的累積記賬收入平均數高達69.71萬元(不可提現)，但是村民家戶全年現金收入的平均數卻只有5.18萬元，扣除一年全家人的生活開支後實所剩無幾。於是，人們就會在華西村發現，沒錢搞裝修的家庭卻擁有一輛令城裏人羨慕的

(集體配給的)私家車，炎炎夏日住(集體配給的)豪華別墅，村民卻可能依然用蒲扇代替中央空調(因為每年需4萬元左右的電費支出)。再如，華西是一個沒有假日的村莊，每天上午7-11點、下午1-5點是上班時間，到晚上8點就已經進入了家家黑燈的休息狀態。通過這些翔實的田野材料書寫成的撰述，讀者能夠玩味「天下第一村」村民的生活細節，從而對後集體主義實踐多一種直觀的體驗。

再次，作者對於材料的剖析，往往能發常人所未見。舉例來說，對於訪談中難免會碰到的村民宣傳口吻般的高調，作者並未簡單地棄置不顧，而是通過縝密的分析和思考，深入其表象背後，尋找真相。周怡發現，高調有時出自村民內心，是一種被調教所內化的肺腑之言。因此她進一步指出：某種意識形態宣傳的東西，完全可能成為村民的慣習，內在於心，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他們的一言一行(頁23)。

當然這部作品也留有些許缺憾。比方說，《中國第一村》本是見微知著之作，重點在於揭示整合的機制及其背後的邏輯，但行文過程中，作者有時自覺不自覺就地跨越了這一邊界。例如作者在本書〈結語〉中的這一論斷：

過去的社會主義集體時代，華西村的精神狀態和先進的社會主義實踐，同整個中國一再堅持的政治專制主義與經濟公有制相結合的體制一脈相承。那時候，農民沒有自己的選擇。現在的市場經濟時代，嚴格意義上說，華西村堅持的仍然是政治專制和經濟公有制的結合。但

2003年春節，當吳仁寶宣布「我個人將享有整個華西的51%的股份控制權」時，很多人說華西村變了，集體的產權性質正在向股權分割的私有、家族控制轉變。可是作者的研究卻表明，華西經濟產權上的權威壟斷、族親壟斷，同樣服從於村莊共同體整合的需要。

作者為我們提供了諸多見微知著的細節。通過這些田野材料書寫成的撰述，讀者能夠玩味「天下第一村」村民的生活細節，從而對後集體主義實踐多一種直觀的體驗。

是村民在中國社會大背景下有了選擇的自由，只要村民不惜代價，就可以隨意選擇離開村莊。99.9%村民和村裏的幹部，沒有選擇走這條道路，他們在「生活好」和「民主自由」之間選擇了「生活好」。放棄自由而依附集體大同的心態，其實是中國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理結構。華西村人不過是這種中國文化的具體實踐者或持續保持者而已。（頁299）

引文中從「但是」開始的部分，顯然存在着邏輯跳躍。且不論華西普通村民是否有自主選擇的空間（至少在筆者看來，如果因為離開，就被剝奪一切，從而變得一無所有，恐怕不能算作有選擇的自由），即

以80年代以來華夏大地「去集體化」的浪潮而論，就足以說明農民自身的選擇到底是「自由」還是「集體大同」。否則，當年小崗村按血手印分田單幹的舉動，又作何解釋？同樣的代價下，如果集體大同帶不來「生活好」，人們自然就會選擇單幹；如果失去「民主自由」，能換來「生活好」，村民大體也還能忍受，此時他們會暫時懸置對前者的追求；如果「生活好」的同時，還能有「民主自由」，人們當然會歡欣鼓舞而不是拒斥後者。從全書論述中，我們得不出作者這樣的結論，即「放棄自由而依附集體大同的心態，其實是中國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理結構」。

與保守主義訣別的宣言書

● 孫傳釗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著，會田弘繼譯：《アメリカの終わり》（東京：講談社，2006）。

繼2006年2月19日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上發表題為〈新保守主義之後〉(“After Neo-conservatism”)一文，2006年2月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對布什 (George W. Bush) 政權和新保守主義進行批判和反思的新著《美國處在十字路口》(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在美國和歐洲同時出版（歐洲版的書名